

格雷马斯叙事学理论视域下的《南方有令秧》

司冉冉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南方有令秧》是笛安从青春文学转向历史题材的一次重要突破，她首次将视角聚焦在一个明朝徽州商户人家的女儿身上，从如何嫁入已显颓势的书香门第唐家，到丈夫意外身亡、十六岁便成了孀妇；从如何在众人帮助下躲过殉夫之劫，到和失意浪子谢舜璋苦心经营最终拿到贞节牌坊，笛安把令秧一生的传奇经历娓娓道来，也展现了万历年间深宅大院中众人形形色色的命运。本文运用格雷马斯叙事学理论，解读《南方有令秧》中文本的表层与深层结构，通过剖析唐家众女子在令秧拿贞洁牌坊过程中给予她的帮助和谢舜璋、川少爷、侯武等男性形象在这一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发现书中具有现代精神女性形象，其成功的深层逻辑仍然是对男权社会的妥协、对封建制度的顺应，进而揭示封建宗法制社会对于女性生命、精神的残害。

[关键词]格雷马斯；《南方有令秧》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7.1077

一、《南方有令秧》的表层含义

格雷马斯在分析作品时，发现一个文本往往由两种结构组成，表层叙事结构和深层叙事结构。表层叙事结构指的是作品外在的语言组织形式，对围绕主体直接展开的主线索进行梳理，主要包括产生欲望、具备能力、实现目标、获得奖赏四个阶段。对文本进行表层结构分析，能够快速厘清故事情节的发展脉络，树立文学批评的全局观。《南方有令秧》以令秧为中心，围绕令秧如何得到贞节牌坊展开情节，这是《南方有令秧》最主要的叙述框架，也是该文本的表层结构。

(一) 产生欲望：得到贞洁牌坊

主体欲望往往是故事发展的推动力。在《南方有令秧》中，令秧最大的目标就是贞洁牌坊，全书也大篇幅地叙述了令秧为得到贞洁牌坊所做的准备和努力。但是这一追求不是一开始就确立的，而是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后，最终得以形成。令秧最初在惠娘的提醒下，得知烈妇在守节一定年限后能够得到朝廷的旌表，树一块牌坊，甚至能够减免整族的徭役，她意识到这是在余生可以做的一件很了不得的事，因而产生了得到贞洁牌坊的想法。接着在族内长辈的半劝诫半威胁下，被暗示殉夫以得牌坊是孀妇最好的归宿，是天道，这一行为再次强化了令秧想要得到贞洁牌坊的欲望。最后，令秧在与谢舜璋的交谈中对于如何得到贞洁牌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谢先生的支持使得令秧彻底坚定了自己的决心。至此，得到贞洁牌坊成为令秧最重要的目标，令秧对牌坊的追逐贯穿始终。

(二) 具备能力：贞洁事迹声名远播

主体必须具备与实现目标相匹配的能力，才能赢得客体，实现目标。文本中令秧实现目标的条件和方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令秧丧夫时不满三十岁，太祖又破了继室夫人不予旌表的规矩，因此她殉夫即可拿到牌坊，但显然这不是最佳办法。令秧在众人的帮助下，逐渐具备第二阶段的能力，先是以怀孕之名逃过殉夫之劫，顺利地活下来，又在谢舜璋的帮助下一步步打造了个人贞洁事迹的传奇，声名远播，最后将通过宦官杨琛将守节之事禀告给皇帝。令秧第二阶段的能力主要是善于利用周围人脉和所处制度的能力。

(三) 实现目标：牌坊建成

在主体具备能力后，就会逐渐展开动作，目标也会循序达成。在谢舜璋的指导下，令秧认识到只有让男人知道女人的贞洁，才能拿到牌坊。在这一前提下，对令秧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成了把守节的事情传扬出去，为此谢舜璋前后共策划了三件事。一是借为老夫人祝寿举办“百孀宴”，邀请几个大族及周边所有孀妇赴宴，表面上是为福泽邻里、为后人

积德，实际上要通过一篇《百孀宴赋》将唐家主母令秧的妇德远扬。二是在令秧为止流言断臂以后，以她为原型写成剧本《绣玉阁》，随着新戏的广泛传播，整合徽州的人都知道令秧这个如文绣般的烈妇。三是正值令秧继子高中进士之际，被令秧救了的宦官杨琛将令秧的事情上奏给皇帝，皇帝决定旌表令秧。令秧最终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牌坊。

(四) 获得奖赏：世俗认可，内心满足

如果说实现目标是主体状态从不具有到具有的质的转变，那获得奖赏就是确认主客体之间关系的真实性，以及这种新的关系状态带给主体的影响。令秧在拿到牌坊后，首先得到的最直接奖赏就是世俗认可，牌坊本身就是男权社会对女性贞洁的最高赞誉，更何况这一赞誉还牵涉着整个家族的实际利益，即减免赋税，令秧因此得到了族中长辈的尊重和肯定。但更重要的奖赏是令秧认为自己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内心满足。令秧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个“传奇”。

二、《南方有令秧》的角色模式

格雷马斯对文本中推动情节发展的行动者进行分析，并用符号学的方法将其划分成不同的范畴。由于情节发展的需要，行动者代表的角色模式往往成对出现，格雷马斯认为主要有三种相互对立的语义结构，包括主体和客体、发出者和接收者、辅助者和反对者。主体和客体分别是情节展开的原因和动力，而具体作品中时常出现同一个角色担任多重行动任务的情况，发出者与接收者可能会和客体与主体相对应，《南方有令秧》中正是如此。辅助者负责为主体提供帮助，协助主体达成目标，反对者则通过制造障碍，阻挠发出者和接收者的对接。在《南方有令秧》中，角色模式围绕着令秧为得牌坊营造个人节妇形象而展开，牌坊对令秧的诱惑和令秧对牌坊的追逐，辅助者和反对者两股力量的层层对决，通过分析故事的角色模式，读者很容易感受到故事的张力。

(一) 发出者→客体←接收者

(牌坊) (牌坊) (令秧)

由发出者——客体——接收者横向顺接组成了角色模式的第一条主线，作品中相对应的发出者和客体一致，都是贞节牌坊，主体也就是一心想要得到牌坊的令秧。牌坊作为发出者，对令秧具有极强的诱惑力，这种吸引并不在于牌坊是对贞洁精神的肯定，而是在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令秧才没有把自己禁锢在追求贞洁本身，尤其在了解到拿牌坊无非是让所有人知道她的贞洁这一本质后，守节的真实性就被如何宣传和走捷径的想法而遮蔽了。牌坊作为客体，是令秧势必完成的目标。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在多重条件下建构起来的，令秧需要依赖牌坊而实现

自我价值，且具备实现目标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笛安在塑造人物时赋予令秧极为特殊的性格特点，令秧的天真让她单纯不世故，对俗事免于纠结，同时也让她长期以来都缺乏自信和成就感，牌坊给家族带来的实际利益吸引了她，她很快意识到这是在她能力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事件。另外，令秧未染尘俗的心境能够让她不为情事所累，不沉溺丈夫离世的哀痛之中，牌坊出现得恰逢其时，令秧很快把余生的期盼放在了新的目标上。二是令秧作为普通人内心深处对于传奇的追求，令秧想实现的并不只是顺利地熬到50岁，按部就班地得到朝廷的旌表，而是希望用最短的时间达成目标，因此书中最后，令秧从守节到得到牌坊一共用了十五年，牌坊建成之时，她尚未满三十二岁，在当时可谓空前绝后。可见，成为人人人口中的传奇才是令秧追求牌坊的另一面。

(二) 辅助者→主体←反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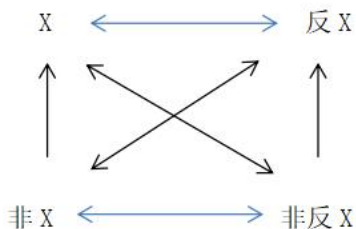
(谢舜晖) (令秧) (侯武)

围绕着主体追求客体这根主线设置相应的辅助者和反对者，使文本叙事变得复杂起来，意蕴也更加丰富起来。这里的辅助者指的是在令秧拿牌坊过程中起到助力作用的人，反对者即阻止令秧拿牌坊的人。实现目标要先具备能力，在族内长辈要求令秧殉夫的情况下，生存成了最基础的能力，令秧在云巧、蕙娘等人的帮助下与丈夫的长子川少爷结合并成功怀孕，躲过殉夫一劫，这是令秧有条件完成目标的前提。令秧实现目标最重要的辅助者，是为她出谋划策的谢先生。在与令秧达成一致后，谢舜晖开始对令秧的“节妇”人设进行包装、运作、宣传，最后成功地树立起令秧徽州著名节妇的形象。谢舜晖对令秧形象的运营是令秧拿到牌坊的关键。

《南方有令秧》中反对者对应的人主要是侯武和三姑娘的姑爷。侯武是唐家前管家的儿子，前管家无故身亡，侯武为报父仇来到唐家，故意接近为令秧会诊的罗大夫，打探令秧女儿的身世之谜，并将之传扬出去，一时之间引发了诸多关于令秧的风言风语。而最后一层窗户纸又在一次争吵之中，被三姑娘的姑爷戳破，使得令秧不得不直面流言，自断胳膊以证清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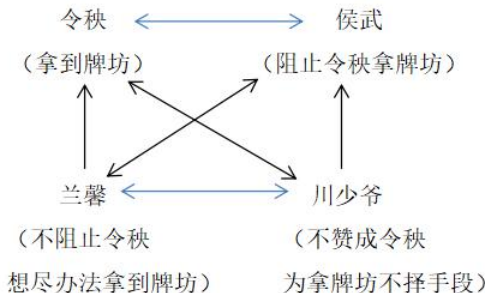
三、《南方有令秧》的深层结构

普罗普在分析民间故事时引入了“功能”这一概念，并根据人物的行为动机进行“功能”划分，结果故事被分解成多个“功能”组成的序列，其叙事结构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一研究最终成为叙事学的先驱。随后，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特拉尔·热奈特、格雷马斯等人开始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分析叙事文本，格雷马斯更是在二元对立的语言结构的启发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符号矩阵，也就是文本的深层结构。深层叙事结构隐藏在语言组织形式背后，却影响着整个作品的意义生成。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包括实体“X”、实体的对立面“反X”、与实体不同但不明确反对实体的“非X”、还有与“非X”相对立的“非反X”。故事以实体及其反对者为起源，接着又围绕其他与实体有关系的因素铺开，最终使情节发展完善。



《南方有令秧》围绕令秧拿牌坊这一中心事件展开，反X也就是阻止令秧顺利拿到牌坊的人，在书中最有力的阻碍者就是侯武，侯武的父亲被唐家逼死，侯武为了给父亲报仇在唐家潜伏多年，结果唐家老爷意外离世，侯武将仇恨转移到了唐家夫人令秧身上，在得知令秧的女儿激姐实为私生女时，便将这一事实大肆宣扬，对令秧的名声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也极大地摧残了令秧的身心。另一个试图妨碍令秧拿牌坊的人是云巧，云巧前期作为令秧的辅助者，对令秧私生女的秘密一清二楚，后期因对激姐的婚事不满对令秧心生恨意，在令秧即将得到牌坊之时，将令秧的秘密告知族中长辈，若非族长为了唐家名声和牌坊所带来的利益没有声张，这对令秧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代表补充关系 X和 反X 是相对立的两项，在故事的进程中又出现了非 X 和非反X，从文本内容可知，非X指的是不阻止令秧拿牌坊，但是这一范畴的人数过多且不具备代表性，因此将行为者与知道令秧守节隐情的特征相联系，仍然没有做出反对行为的，才可以说是典型的非X，非X即为不阻止令秧想尽办法拿到牌坊。兰馨在无意中得知激姐的身世后，先是告诉令秧自己什么也没听到，而后选择自尽，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让令秧安心，表明了其对令秧所作所为不干涉不反对的态度。非反X则指的是不赞成令秧为了拿到牌坊不择手段，川少爷无法理解令秧对牌坊的执着追求，因此在令秧不惜断臂以正清白之后，对令秧产生偏见，其后更是因为令秧收留宦官影响了他读书人的风骨，和令秧大吵一架，两人的关系也急转直下。



《南方有令秧》作为笛安转型的代表作品，一经发表就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其“以淫写贞”的创作方式更是激起了广泛的讨论。学界对于《南方有令秧》的研究，多从历史叙事和主体建构两个维度出发，本文通过采用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的分析方法和叙事语法，挖掘作品深层结构，清晰地展现人物行为的内在逻辑。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在令秧拿牌坊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男性角色，透过女性自主精神觉醒的表层看到封建男权制度的潜在作用，对于帮助读者更直观地领会作品主题，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郑宇辰. 南方有令秧 ——论令秧人物形象特点[J]. 北方文学(中旬刊). 2020, (6). 20-21.
 [2] 李环环. 从青春困境走向精神成人——论笛安小说中的主题意蕴及文化内涵[D]. 杭州师范大学, 2019.
 [3] 王宏. 古代女性的挣扎叙事: 《南方有令秧》[J]. 昌吉学院学报. 2017, (2). 33-37.

作者简介:

司冉冉(1996-), 女, 河北邯郸人,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硕士研究生在读, 从事文艺学研究。